臺大歷史學報第25期
2000年6月，頁53-83
BIBLID1012-8514(2000)25p.53-83

戰國時代「勢」概念發展析探

盧瑞容*

提　要

本文主要以統治學意義上的「勢」論為中心，探討「勢」概念在戰國時代的發展情形，並從「相對關係」的角度分析其哲學義涵。

筆者首先以《孟子》、《莊子》、《戰國策》為主要依據，考察「勢」概念義涵在戰國中後期所呈現的全面性發展，其中以統治學上的「勢」論最為興盛。而代表儒家的《孟子》及代表道家的《莊子》對這即將成為主流思潮的法家之「勢」（權勢、威勢、勢位）主張，則顯現相當程度的反對。

《荀子》書中有許多「勢」論。荀子除了擅長以「勢」表達各種層面的概念之外，對法家君王之「勢」主張則有矛盾之立論；而將君王之「勢」提昇到理論層次，更使《荀子》在法家「勢」論發展過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韓非子》書中除了眾所周知的一般性的「勢」治論之外，〈難勢〉篇特別值得吾人注意。筆者從篇中「隱括之法」、「度量之數」、「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等譬喻，嘗試釐清所謂的「人設之勢」應為「制度」之義，希望能闡明〈難勢〉篇的真諦。

最後，本文從「相對關係」的角度分析戰國時代「勢」概念所蘊涵的時間觀與空間觀。結論是：戰國時期的知識階層對「空間之勢」（包括大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之空間結構）的認知與操控，都勝過對「時間之勢」的了解與掌握。

關鍵詞：勢　儒家　道家　法家　相對關係　時間觀　空間觀

---

* 作者係宜蘭技術學院人文及科學教育中心副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二、統治學上「勢」概念的興起
三、荀子「勢」論——時代風潮下的的矛盾產物
四、「制度」義涵的「勢」——
重探《韓非子》〈難勢〉篇主旨
五、從「相對關係」看戰國時代「勢」概念發展
六、結論

一、前　言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中，「勢」概念是一個義涵多端的語詞。學界都知道「勢」是先秦兵家特有的術語，也是法家三大核心主張之一。筆者前此曾對原始「勢」概念的產生及古代兵家「勢」概念的義涵——亦即西周時代「勢」概念的起源及春秋時代「勢」義涵的發展——作過探討；[1]本文將承接該文，繼續對「勢」概念在戰國時代的發展，作歷史性的考察，及哲學義涵的分析。

這一個時期的「勢」概念，主要是法家意義上的「勢」——君王的「勢位」、「威勢」、「權勢」——之理論，獲得很大的發展。根據韓非的說法，原本法家諸派於「術」、「法」、「勢」三說各有所崎輕崎重——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慎到重勢——而到了他的手裏則集其大成。[2]隨著法家勢力的壯大，日後在思想史上，法家的「勢」概念可說佔

1 參見：拙文，〈中國古代兵家「勢」概念析探〉，刊於《清華學報》新 29 卷第 2 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1999 年 6 月），頁 113~136。該文及本文均為筆者所獲國科會 87 年度補助研究計畫「中國古代思想史中『勢』概念的發展」〔NSC87-2411-H-197-001〕之一部分。而該計畫所探討之「勢」，其時代乃先秦至西漢初期為止。漢初之「勢」概念別有一番發展，筆者將另以別文發表。三文若能相互參看，更可看出古代思想史中「勢」概念發展之全豹。

2 《韓非子》〈定法〉篇一開始，韓非便設問：「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君無術則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了「勢」論的主流優勢。

但這種統治學上的「勢」主張在成為政治思潮的主流之前，也是經過了一段漫長的歲月醞釀，才告脫穎而出。本文將循著下列思考，循序探討，以期對戰國時代的「勢」概念發展有深入的理解：在春秋時代還完全不成氣候的為君王著想的統治理論之「勢」主張，到了戰國時期，是什麼樣的歷史條件，提供它成為思潮之主流？其形成過程如何？而對這種沛然莫之能禦的統治學上的「勢」主張，孟子、莊子、荀子等的立場為何？使法家的「勢」主張真正登上理論層次的關鍵人物是誰？韓非的〈難勢〉篇為什麼會引起學者的爭論？到了戰國時代已經成形的種種「勢」論，究竟有何哲學義涵？簡言之，本文將對「勢」義涵在戰國時代的發展先從事歷史性的考察，再從「相對關係」的角度分析這些「勢」概念的哲學意義。

在材料的引證上，本文將以真偽無疑義而內容能顯示戰國時代重要學派之「勢」義涵「發展」的經典著作為主要依據，因此墨家方面是《墨子》、儒家是《孟子》及《荀子》、道家是《莊子》、縱橫家是《戰國策》（並參考《戰國縱橫家書》[3]）、法家自然是《韓非子》；而《商君書》及《呂氏春秋》只在相關論述時提及。蓋《商君書》本身為依託之書，其作者不明、成篇成書年代亦難以斷定，[4]無法從其中看出「勢」概

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篇末結論又批評「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據：王先慎注，《韓非子集解》〔臺北：華正書局，1991。下同〕）。而〈難勢〉篇則專為改進慎到之「勢」說而設難問論。依韓非之說則「申不害重術、公孫鞅重法、慎到重勢」。但在韓非之前，荀子卻謂「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埶而不知知。」（《荀子》〈解蔽〉篇。據：王先謙著，《荀子集解》〔臺北：華正書局，1993。下同〕）於「法」「勢」的主張人物與韓非之認定有所不同。

3 《戰國縱橫家書》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之一種，內容與今本《戰國策》類似，1976年12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臺灣於民國66年5月出版時，易名為《帛書戰國策》（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4 賀凌虛曾經對宋代以迄現代眾家學者對《商君書》真偽的考辨資料，作了很周全的蒐集及分析比較。其整體結論是：該書真偽相雜，「將其視作戰國時代迄於漢初，商鞅及其後學所共同發展出來的學說較為妥當」。見：氏著，《商君書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附錄」〈商君書及其基本思想析論〉「壹、商君書的探析」『二、商君書真偽的推究』，頁209~227。引文見頁2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念的「發展」脈絡。《呂氏春秋》成書於統一前夕，結構又十分謹嚴，然而是「整理歸納」的書籍，本身對「勢」概念並無特殊主張或進一步發展；即使有〈慎勢〉一篇，也只是對戰國時代各種「勢」義涵的雜論，自身並無中心主旨。若一定要說兩書對於「勢」概念的發展有什麼特殊意義的話，那就是相對於當時其他典籍而言，它們對於「時勢」有較深入一點的思考，可能給予漢初賈誼某種程度的啟發，這點將會在第五節述及。

二、統治學上「勢」概念的興起

本節將探討戰國中期法家興盛之前，統治學上「勢」概念的醞釀發展狀態；其順序則先《墨子》、《孟子》、《莊子》，而後《戰國策》。[5]

筆者於前此「勢」概念發展之研究中指出：截至春秋時代為止，反映在《國語》、《易》〈坤卦・象傳〉及《孫子兵法》等文獻中的「勢」，儘管其義涵已經是複雜多端，卻無一義與「上下統治關係」有關。[6]然而由於「勢」的本字「埶」之初義「種植」，本身就含有「力」（生命力、發展力）的因素；而文獻上「勢」在《國語》作首次登場時又身披「險要地勢」之袍，隱隱然透露著「位差」及「位差動能」之義，[7]因此日後「勢」之與「權力」、「位階」、「威武」等概念結合，形成「權勢」、「勢位」、「威勢」等特定統治學上的術語，而為法家所樂用，這些可

5 根據學者的重新考訂，《戰國策》及《戰國縱橫家書》都以蘇秦為主體。過去學界都依《史記》記載而認定蘇秦先孟子 30 年而亡；隨著《竹書紀年》及《戰國縱橫家書》的出土，學者紛紛對六國年表及蘇秦生平作了新的考訂。依唐蘭、楊寬、馬雍等氏之見，則蘇秦反為張儀晚輩，孟子於宣王時遊齊，之所以唯言公孫衍、張儀，而不及蘇秦，並非蘇秦已故，而是蘇秦尚未進入齊國。參見：《戰國縱橫家書》附錄：一、唐蘭，〈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長沙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頁 123~153；二、楊寬，〈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史料價值〉，頁 154~172；三、馬雍，〈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各篇的年代和歷史背景〉，頁 173~201。

6 參見：註 1，前引拙文，頁 117~123 及頁 134~135。

7 同上文，第二節「『勢』概念的發生其早期意義」，頁 115~1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都是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

如上所述，在春秋時代，諸子尚未以「勢」這個語詞來論述有效率的治國主張，或鋪陳緊張矛盾的上下統治關係，究其原因應該是政治現實上還沒有這個需要。蓋春秋諸霸還在體面上維持彬彬有禮的「尊王攘夷」宗法封建貴族之風範；到了戰國時代，則群雄不再把周天子放在眼裏，各自突出，於列強之間領導權之競爭激烈，於諸侯國內則統治權不斷向君王集中。我們推測應該是這樣的歷史背景加速了「權勢」、「威士」、「勢位」等這套法家之「勢」系統的運轉。《戰國策》及《孟子》、《莊子》從正反兩面為我們證明了這項事實。

目前我們仍然無法以文獻來證明是誰啟動了這套系統的開關；[8]但是《墨子》這部春秋戰國之際的著作，已將「勢」使用為「統治者」的「勢力」之義：

> 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眾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9]

這段話的最後一句在讚頌文王不仗著「暴勢」——強大的勢力——奪取農人的穀物牲畜。此處之「勢」便有著統治者「權力威位」之義。雖然《墨子》於此並不在頌揚「暴勢」，但是我們卻可以看出「勢」之為「權勢」、「威勢」、「勢位」的意義，在當時已然成形。

這也是《墨子》裡唯一一次出現的「勢」字，而且對這種意義的「勢」是負面描述。到了戰國中期，「勢」義涵多方發展的步伐加快了，其中做為「權勢」「勢位」「威勢」意義的「勢」更有明顯興盛的趨勢；儒家、道家是反對這種主張的，因此《孟子》、《莊子》書中對這種「勢」

8 現行《管子》書中充斥著戰國後期完全為君王統治考慮的法家意義之「勢」主張，而成熟的複合名詞「形勢」（〈七法〉）、「權勢」（〈七主七臣〉、〈明法解〉）、「威勢」（〈明法解〉）也運用得很嫻熟，這些現象卻正好證明了《管子》書的晚出。因為管仲時代的歷史環境（「尊王攘夷」），應該還沒有土壤來提供君臣關係緊張之法家「勢」論的萌芽及茁壯。《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謂：「恃勢而不恃信，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此文是韓非論「信賞以盡能」之重要，而以歷史人物為例，我們也不能據此而言管仲首創法家「勢」說、晉文公首創「術」說。

9 《墨子》〈兼愛〉中篇。據：孫詒讓著，《墨子閒詁》（臺北：華正書局，1995），頁 1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總是給予負面評價。

《孟子》使用「勢」字，次數不多（只有五次）：

1.〈公孫丑〉上篇中，孟子引齊人之言[10]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11]以「勢」與「時」並列，含有「有利時機」之意。

2.〈離婁〉上篇中，公孫丑問孟子：「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答曰：「勢不行也。」此「勢」是「客觀情勢」之義。

3.〈告子〉上篇，孟子曰：「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此「勢」，則是「外在力量」、「外在形勢」之義。

4.〈盡心〉上篇：「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其道而忘人之勢。」前後兩個「勢」字均為「權位」之義。

從上面引文看來，孟子使用「勢」字之次數雖少，卻簡單有力地呈現出時代特色：

(1)〈盡心〉上篇兩次「忘勢」之說，用來降低「權位」的重要性。孟子這樣的言論從側面呈顯出「權勢」、「勢位」之意識，已在大環境之下更具體呈現。

(2) 中性意義的「客觀情勢」、「外在形勢」，在《莊子》中也出現兩次，《戰國策》中更時有所見，意味即將成為普遍概念。

(3)「勢」的時間觀之思考明顯成形。孟子時代齊國已有這樣的諺語：「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孟子引用來回答弟子之問，顯示孟子也將「勢」做為「有利時機」來思考。這個諺語同時還預告了「時」與「勢」結合成一個複合名詞的可能趨勢。

---

10 日本學者金谷治於此注意到「勢」概念的發展和齊國有地緣關係。他列舉下列四例以為證明：〔1〕《孫子兵法》作者孫武雖活躍於吳國，本是齊國人；〔2〕孟子所引「雖有智慧，不如乘勢；……」為齊國諺語；〔3〕管子為齊國人（《管子》有〈形勢〉篇）；〔4〕法家前輩中以重「勢」著稱的慎到是齊稷下學者。金谷氏所論倒是值得考證的一見。見：氏著，《秦漢思想史研究》（京都：平樂寺書店，1992再版）〈再版あとがき〉，頁607~608。

11 據：朱熹，《四書集注》〈公孫丑章句上〉（臺北：世界書局影印本，1997版。下同），頁2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莊子》中有十一個「勢」的用例。它的使用方式頗有理路可循：

(1) 內篇無「勢」字，十一個用例全在外、雜篇。這個現象說明了時代愈晚，道家學派也無法自外於以「勢」來多方思考的潮流。

(2) 複合名詞「時勢」（〈秋水〉篇）、「權勢」（〈徐无鬼〉篇）的出現，是一項重要的進展，使字義的使用更明確，不易引起混淆。

(3) 十一個用例中，除了一個作「時勢」、兩個作「情勢」解之外，其餘八個全作「權勢」解，而且全遭反對、甚至遭嘲諷。例如：

>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无為也。（〈徐无鬼〉）[12]
>
> 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盜跖〉）
>
> 客（謂孔子）曰：「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漁父〉）

(4) 作「時勢」解的，又與孟子所引齊國諺語中的「有利時機」之義，大不相同。

〈秋水〉篇借用孔子之口言曰：

> ……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

這裡的「時勢」之說已經開啟中國歷史遞嬗中一個相當重要的思考課題：「時勢」的意義，就個人而言，是「遇」、「不遇」的問題；就國家或軍政領導者而言，則為政策或措施「變」、「不變」的問題。莊子學派的重點在於思索個人的適性取向，所以在此突出了個人「得失」、「時遇」的問題。至於順應「時勢」而改變政策或措施的言論，則是為君王奔走獻計的縱橫家之所長了。蘇秦對齊閔王說：

>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

12 據：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版。下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成事者寡矣。[13]

而馬服對田單說：

君非徒不達於兵，又不明其時勢。……[14]

兩人雖然都針對「用兵」而言「時勢」，但遊說內容都已蘊涵「識時務者為俊傑」之義。

在《孟子》、《莊子》中用量仍少的「勢」字，到了《戰國策》就顯著增加了。《戰國策》的記載呈現出奔走於七國之間的滔滔辯士，已經能廣泛而靈活地運用「勢」來思考。隨著時局的演變及需要，不但「情勢」、「地勢（地理形勢）」、「時勢」等概念逐漸普遍化，更明顯的是「勢」的義涵大量地向具有統治意義的「權勢」、「勢位」、「威勢」集中，預告了法家之「勢」的蓬勃發展。

今本《戰國策》總共出現了51次的「勢」，[15]其用法及意義有不少特點值得吾人注意：

(1) 約有21次（也是次數最多者）的「勢」字意義指涉君王、大國或權臣的「權勢」、「威勢」、「勢位」，明顯地反映出君位日隆、中央集權的時代脈動。

(2) 約有18次大略為廣義的「情勢」、「（一般性的、非兵家意義的）形勢」、[16]「態勢」之意義，顯示出外在、客觀的情況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

(3) 除了《莊子》中已有的「時勢」、「權勢」之外，《戰國策》中還

13 《戰國策》（據：四部備要本。下同）卷第十二，「齊五」，〈蘇秦說齊閔王〉，頁1上。

14 《戰國策》卷第二十，「趙三」，〈趙惠文王三十年〉，頁1上。

15 本文據「四部備要」本統計。另外，《戰國縱橫家書》中出現兩個「埶」（「勢」之初文）字，一在第十七章〈謂起賈〉章：「以燕王之賢，……利擅河山之間，埶无齊患，交以趙為死友，……」，此為今本《戰國策》所無；一在第二十章〈胃燕王〉章：「燕趙弗利而埶為者，以不信秦王也。」與《戰國策》「燕一」〈齊伐宋，宋急〉章所載相同。

16 兵家意義的「形勢」，與我們一般概念中的「形勢」不同。請參見：前引拙文，頁126~1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地勢」、「勢位」等複合名詞，以及成語「勢不兩立」，而這些語詞的意義與用法都一直沿用至今日。

(4) 在《戰國策》裏，蘇秦使用「勢」，有他的出色地位。除了個人使用頻率最高之外，舉凡「地勢」、「勢位」、「勢不兩立」等語詞，依現有的文獻看來，蘇秦都是第一位使用的。

若拿春秋時代「勢」字運用最多的《孫子兵法》與戰國時代的「勢」義相較，則兵家的「勢」出於戰略及戰術需要，其義涵傾向於抽象化的軍事概念，有許多用詞意義甚至不易理解；而戰國時代的「勢」則貼近社會生活，甚至著眼於現實政治需求，因此其意義雖是紛然雜出，但是生活化的用法，非但容易理解，甚至還能襲用至兩千多年後的今天。此外，複合名詞「地勢」、「時勢」、「勢位」、「權勢」的出現，一方面顯示「勢」這個語詞由於其造字結構潛在因素的發展而終於與空間觀、時間觀、權力價值觀結合；[17]另一方面，複合名詞使「勢」的義涵更為明確，在使用上更形方便，也加速了「勢」概念的流傳。

法家概念的「勢」，大有助於君王權力威位的提昇與保障。所以從《孟子》、《莊子》及《戰國策》可以看出：戰國中期以後雖然各種「勢」概念紛然雜出；但是隨著時勢所趨之需，法家「勢」論迅速發展壯大，而成為思潮主流。儘管墨子、孟子、莊子及其門徒，不贊同法家這種「權勢」、「勢位」、「威勢」之主張；而身為先秦末代儒家大師的荀子，則採取了不同的態度。

三、荀子「勢」論——時代風潮之下的矛盾產物

在先秦，對於「勢」字的使用頻率度，可以讓我們從另一角度看到

「意義多變的兵家『形勢』說」。

17 「勢」的本字「埶」之初義「種植」，本身便已隱含著「時間」、「空間」、「生命力、發展力」（引申而有「權力」）諸潛在因素。請參見：前引拙文，第二節「『勢』概念的發生及其早期意義」，頁115~117，及第四節「『勢』概念所顯示的『相對關係』之思考」，頁1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儒、法兩家的對立。《論語》及《大學》、《中庸》均無「勢」字，顯示孔子及弟子們未曾以「勢」概念來思考。這固然是因為春秋時代「勢」概念還未十分普及，但亦非全然沒有，除了《國語》及《孫子兵法》中出現的「勢」概念之外，即使是孔子自身的一段經歷，便有齊國大夫用「勢」概念來預期孔子治事之成果。[18]孟子時代各種意義的「勢」概念已頗為發展，而且「權勢」概念也已成形，但《孟子》書中也才出現五次的「勢」，並且於提到法家意義的「勢」時，都是站在對立的立場論述。這可能是因為法家意義的「勢」，君王的「力」(Power)太被強調，為孟子所不喜之故。

《荀子》書中則出現多達84次的「勢」字，[19]這個現象顯示了荀子使用「勢」字的嫻熟，也顯示了戰國後期「勢」論發達，連儒家都無法自外於這個風潮。孟子對於「勢」概念的使用屈指可數，荀子則經常用「勢」來表達各方面的概念，不但所指涉的範圍十分廣泛，而且其義涵又十分豐富。[20]儘管如此，其中還是以統治學上的「勢」論最為突出。這可從為兩個角度來分析：第一，在戰國時代統治學上「勢」概念的發展過程當中，《荀子》可說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因為《戰國策》中諸策士的種種涉及「權勢」、「勢位」、「威勢」之說，都還僅止於「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眾」、「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之類的泛言性

18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據：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47〔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下同〕，頁748下）此一故事，似乎又可加強註10中金谷治氏所推測的「『勢』概念的發展與齊國有地緣關係」之佐證。

19 與法家相較，遠超過《管子》的63次、《商君書》的31次，僅次於《韓非子》的171次。

20 荀子自身所運用的「勢」說，約可分為兩大類：〔一〕涉及政治生活者：書中法家意義的「權勢」「勢位」「威勢」等，理論最盛。〔二〕涉及社會生活而為中性意義者：包括「客觀情勢」、「發展趨勢」、「情勢發展」、「外在形勢」、「地位」、「地形」、「有利地勢」、「（外在而不由自主的）力量」及「物類」等諸種意義。另外還有無法分類而意義十分特殊的「義榮⟷勢榮」、「義辱⟷勢辱」之論，因與統治學理論無關，也與本文第五節所討論的時空觀點之「相對關係」概念無關，因此本文對此不再進一步探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質；[21]到了荀子手中，才昇高到理論層次，真正成為「尊君學說」。第二，荀子為了尊君而賦予君王相當高的勢位、權勢及威勢；就這一點而言，頗合乎學者所指出的：「孟荀皆生國大君威之時代。孟子申古義以抗潮流，荀子就時勢以立學說。」[22]但荀子究竟是儒家，深知權威勢位不足恃，一方面又主張需以「道」為後盾。因此，統治學上的「勢」論，在荀子的主張中，出現了相當程度的矛盾現象。

(一)君王擁「勢」之需

在整個大環境下，荀子順應時代潮流立論，則不能不尊君，尊君就不能不給予威權勢位；再說，荀子賦予君王難以負荷的重責大任，[23]相對的，也必須給予君王無上的威權勢位，否則如何達成「王者之事」？所以荀子說：

> 天子者，埶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正論篇〉）

再說一般百姓，生而為圖利之人，需要君王憑著勢位來引導向善，庶幾使社會正理平治，免於偏險悖亂：

> 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埶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榮辱篇〉）

此外，荀子又強調，沒有勢位權威，則聖人只能以清名活於世上，例如孔子；有了勢位權威，聖人才能直接造福天下，例如舜、禹：

> ……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

21 前者出於《戰國策》卷第十八，「趙一」，〈張孟談既固趙宗〉中張孟談之語，頁4上；後者出於《戰國策》卷第二九，「燕一」，〈燕王謂蘇代〉中蘇代所言，頁11下。

22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0新一版）〔上〕，頁103。

23 荀子筆下的君王是非常不好當的，百姓合理富厚安定和諧的社會生活端賴君王來維持。例如〈富國篇〉云：「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非十二子篇〉）

荀子又主張其實聰明的人君應知道「勢」之得來並不難，只要令百姓願意心悅誠服地跟從，那麼「勢」也就自然而然地隨之而來了：

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埶從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霸篇〉）

換句話說，人主之「勢」還需要「道」來支持，如此則國家大安、大榮；否則的話，自然容易失勢，國家敗壞不說，嚴重的時候個人甚至求為百姓而不可得：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王霸篇〉）

(二)君王「勢」之不足恃

在上引〈王霸篇〉那段話裏，荀子透露了他身為儒者的不安：一方面強調人主是全天下權勢的最大擁有者；另一方面則要主張權威勢位本身無法自安，必須靠道德來支撐。

例如做為一個君子的基本修養之一，便應該是處於富貴時態度愈加恭謹，以削減權勢之威：

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埶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勞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修身篇〉）

而天子固然「埶至重」卻需「形至佚」，以顯出至高無上的尊嚴。[24]這似乎很難，但其實只要懂得藉用賢才，便能輕鬆治國，稱王稱霸游刃有餘；否則事必躬親，必至灰頭土臉，一敗塗地。但是昏君通常不明此理，

24 〈正論篇〉云：「天子者，埶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而形不為勞，尊無上矣。」〈君子篇〉略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只是急著追求勢位，而不知急著找尋賢才：

> 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君道篇〉）

所以君王如果不知修身的重要，只知一味擴張權威勢位，這便是使勢位動搖的原因：「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埶，是其所以危也。」（〈仲尼篇〉）

荀子數次拿夏桀商紂來做例子，說明勢位之不足恃。桀、紂不也都是聖王之子孫，天生就擁有最高勢位，為天下之所宗；然而因為自身無德，眾叛親離，終究須將天下拱手讓予有德之人：

> 聖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後也，埶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埶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天下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正論篇〉）

到那個時候，就連想要以平凡百姓的身分終老都不可得。因此，空有勢位又有何用呢：

> 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老。（〈仲尼篇〉）
>
> ……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埶，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無它故焉，四者竝亡也。（〈王霸篇〉）
>
> 處勝人之埶，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埶，不以勝人之道，厚於有天下之埶，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勝人之埶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彊國篇〉）

從本節的析論，我們看到荀子的務實性格：時代風潮已然如此，與其作無謂對立，不如順應潮流，提倡尊君崇勢；只是無論如何，荀子仍是儒家的代言人，所以在君勢的背後，還是注重尚賢尚德的支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

「勢」概念發展到了戰國時代已是沛然莫之能禦，除了兵家及縱橫家自覺或不自覺地說「勢」之外，在戰國儒學大師荀子手中，「勢」的義涵更是豐富多端；而到荀子弟子韓非筆下，「勢」的意義則大幅狹窄化，專注於君王的權威勢位上。不過，在〈難勢〉篇裏，「勢」卻又有另一番境界。

四、「制度」義涵的「勢」——重探《韓非子》〈難勢〉篇主旨

韓非對君王「權勢」「威勢」「勢位」的普遍主張，學界已討論周詳；本文不擬在此再作申論，而直接進入引起不同解說的〈難勢〉篇。

依筆者統計，《韓非子》出現高達171次的「勢」字，而其義涵大多數都與君王的威權勢位有關。這些用例的統計結果加深了吾人對韓非「勢」論的一般性了解——果然是道地的法家「權勢」、「威勢」、「勢位」之說。所以學者一般也都不免帶著這種看法來解讀韓非論「勢」用力最深的〈難勢〉一篇，特別是他所強調的「人設之勢」。[25]但也有學者注意到這「人設之勢」太特殊，難以與其他篇章的「勢」論並觀，因而有種種不同的解釋。例如，有學者主張〈難勢〉篇第一段為慎子言「任勢」；第二段主旨「任賢」，乃韓非難慎子之論（因為韓非除了主張任法、任術、任勢之外，也主張任賢）；而第三段是他人文字竄入，因為那一段「與韓非思想正相反對，斷非出於韓非之手，乃後人難韓非之辭，

25 學者多將韓非此中之「人設之勢」，解釋為「權力」「威勢」之義。坊間的《韓非子》今註今譯固毋論矣，深入探討韓非政治哲學的，也大抵以此為主論。例如：王邦雄，《韓非子的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9），頁175；鄭良樹，《韓非之著述及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頁495~496。另有學者已清楚說出「中主抱法處勢」的主張是「構想設定永久可資依循的法制」，但作者仍將〈難勢〉篇定位為「以威勢統治為論辯主題的論文」。參見：張素貞著，〈難勢篇——威勢統治的辯難〉，收入氏著，《韓非子難篇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7增訂再版）「輯餘一」，頁317及295。實則韓非該篇論文所辯駁及申張的，與「威勢」完全無關，詳見下文之析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寫者不知，遂竄入正文」；[26]這個論點的缺失，已有學者辨之甚詳。[27]另外，也有學者主張「自然之勢」為「主權之傳襲」，「人設之勢」為「主權之運用」。[28]筆者認為這樣的區分及闡釋恐怕很成問題。首先，「主權」一詞不適合用於對內的統治權，除非別有界定，將「人主之權勢」簡稱為「主權」；但這樣的簡稱是不合政治理論認知的。再說，〈難勢〉篇的「人設之勢」是為「中者」而設計的「勢」，[29]觀韓非在下文所舉之例，就可知道此「勢」與「主權之運用」並無關係。

讓我們再重新考察〈難勢〉篇的結構與義理。〈難勢〉篇內容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從篇首「慎子曰」開始，韓非自稱引自慎到之「勢」說；第二部分從「應慎子曰」開始，韓非假設有人反對慎到之說（從推崇堯舜的主張看來，應該是儒家者流）；第三部分從「復應之曰」開始到文末，則是韓非提出他別創一格的「人設之勢」，並辯駁儒者之「待賢」論。

慎到主張「勢位」比「賢智」重要，理由是：即使賢智如堯舜，若只是無勢位的匹夫，那麼連三個人都治理不來，更別說全天下了；而不肖如桀紂，卻由於擁有天子之勢位，所以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者之不足慕也。」更甚者，「賢者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詘賢者也。」因此慎到的結論可簡單概括為：「勢」優於「賢」。

反對者則說：勢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仍是賢材。因為賢材憑藉了勢位，才能使「勢」發揮正面的作用；否則不肖者得了勢，無異於老虎添了翼，助長其為惡：「桀紂得成四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也就是說：「勢位」本身並無

---

26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臺影印一版），頁891註8，及頁894註27。

27 見：高柏園，《韓非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101~102。

28 陳啟天，《韓非子校釋》（臺北：臺灣書店，「中華叢書」，1958），頁71。而高柏園氏同意他的說法，見：高柏園，前引書，頁111。

29 美國學者安樂哲（Roger T. Ames）已經看出此處的「勢」是「要為一般材質（甚至更糟）的君主設計某種政治體系，並且申明它的政治哲學的實用性。」見：安樂哲著，滕復譯，《主術——中國古代政治藝術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89。但他未具體指出這個「某種政治體系」是什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謂好壞，它既可「便治」，又可「利亂」，端看使用者是否為賢材才能知其後果。所以「勢」要讓賢者使用才好。結論是：「勢」有待「賢」者來發揮其正面作用。

接下來，韓非的辯駁很長，而且說理糾葛，幾乎讓人陷入文字迷陣裏。[30]然而如果我們耐心翦除那些葛藤，則他的思路還是可以清楚尋繹出來。簡單地說，如韓非自己所言，他是支持慎到「任勢不待賢」之說的；然而吾人需要辨明的是：韓非在本篇所主張的「勢」，卻異乎慎到及反對者所說的自然「勢位」，而是指人為的「制度」。

韓非首先聲明他的立場是反對「必待賢乃治」之說。接著說「勢」這個字，名稱雖然相同，但意義卻可以無限多變——如此預告了他的「勢」的內涵不同於前兩者之說。接著他指出慎到及反對者所主張的，都只是「自然之勢」，而他現在所要提倡的則是「人之所設者也」。韓非認為如果一直把「勢」侷限於「自然之勢」（例如桀、紂為聖王之子孫，天生就擁有「勢位」。慎子明言「勢位」，而反對者也依此立論），就會把「賢」與「勢」對立起來，而產生矛盾之說，那麼就無法再作「勢」的討論了。

韓非著名的「矛楯」之寓言，完全針對「客曰：必待賢乃治」之理論而發。反對者認定「堯舜生而在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勢治者則不可亂」，韓非認為：照這麼說，則賢者只要擁有勢位就能做好任何事情而無可抵擋了，這「不可禁的賢者」，韓非把他比喻為「無不陷之矛」；反對者又主張「桀紂亦生而在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勢亂者則不可治也」，韓非又認為：這麼一來，「勢」卻又是可以充分抵擋賢者的，於是韓非又把這「無不禁的勢位」比喻為「物莫能陷之楯」。韓非說「賢」與「勢」的關係如此被對立，而且相互矛盾，因此「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

> 復應之曰：……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

30 所以蕭公權先生說：「韓非反駁之詞文有訛奪，意欠明晰」。見：蕭公權，前引書，頁2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賢與無不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

所以韓非說他不再在這上面打轉，而是要討論另一種經由人工設置、非天生而有的「勢」。這種「勢」既不為賢者設置，也不為不肖者設置，而是為介於賢與不肖之間的「中者」設置的。因為在歷史上，賢如堯舜、不肖如桀紂，都是很久才出現一次的；而在平常的日子裏，人類社會絕大多數的時候卻都是由「中者」在治理，所以要為「中者」規劃考慮。「中者」雖然不像堯舜那麼賢聖，但也不至於像桀紂那樣使壞。他只要「抱法處勢」的話，社會秩序就能上軌道；當然，「背法去勢」的話也能使社會為之大亂（可見「法、勢」之重要）。韓非為此說假設了兩種對立的情況：如果一個社會平常就一直「廢勢背法」，千百年的人間忍受一團亂的社會，得等堯舜般的賢君出現了才能有一段清明的好日子過，而賢君亡後社會隨即又掉入混亂裏，這是「千世亂而一治也」；但是如果平常主政者就「抱法處勢」，使人間社會一直遵循著法則運作，一旦有桀紂般的統治者出現，社會即使不免陷於一時之混亂，也只是「千世治而一亂也」，桀紂亡後社會馬上又會回到正軌的，只要主政者繼續「抱法處勢」的話。

這就是韓非所鋪陳的「人設之勢」之願景。我們如何知道這些「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的「勢」是「制度」，而不是學者一般所認為的「權力」「威勢」「勢位」呢？首先，韓非在文中兩度申言：

> 1.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
>
> 2.……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已矣。

這兩段話聲明了他要申論的「勢」不同於慎子及反對者所言之「勢」（勢位）；此外，韓非在下文還有兩次的譬喻可以證明此「人設之勢」並非權力威位。第一次是：

> 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足用亦明矣。

韓非說：如果沒有檃栝等矯正斜曲的工具及精確的度量工具可資憑藉遵循的話，那麼即使手藝精巧如奚仲，也製造不出一圈車輪來。同理，要是堯舜沒有樹立明確的賞罰制度，「釋勢委法」的話，就算是他們沿街挨家挨戶地去勸說百姓，也是頻遭反駁，不到三戶人家會聽他的話的。韓非得到的結論是：由此可知光是這個「勢」（明確的制度）就夠用了。這是第一次的譬喻；而第二次的譬喻更可以讓我們清楚地看出此人設之「勢」絕非「權勢」、「勢位」、「威勢」之義：

> 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

韓非對反對者先前所言之「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大大地不以為然。他認為這是緩不濟急的：如何等待「古之王良」來「馭今之馬」呢？這就如同越人游水技術再好，中原國家的溺水者也無法企盼他千里迢迢趕來救溺。所以，韓非認為如果以馭馬比喻治國的話，務實之道，還不如五十里就設置一個驛站，備好「良馬固車」，讓「中手」一個接一個去駕馭，如此仍然可以完成日行千里的願望，「追速致遠」，既合乎速度的要求，又達到了長遠的目標，如此何必一定要苦等王良呢？再說，反對者講到駕車時，如果不是舉出王良，就說奴婢會敗壞事情；講到治理天下時，如果不是舉出堯舜，就說桀紂之敗壞天下。這種斷為兩橛的簡單二分法，無中道可行，就如同講到味道時，如果不是極甜的糖漿蜂蜜，就是極苦的苦菜葶藶，中間難道沒有其他味道了嗎？所以韓非強力批評反對者這種言論是照顧不周的「離理失術、兩末之議」。

〈難勢〉篇的第三大段——也就是韓非自己的「勢」論——我們可以分為兩部分來看：一、把「賢」「勢」對立為相互矛盾之物，二、把「勢」提倡為人為設置的「制度」。我們深入探討，認為前者邏輯牽強難以服人；後者則超越了時代，頗合乎現代政治學理論與政治實際。

在政治現實上，韓非無法否認反對者所說的「賢者」加上「勢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或「不肖者」加上「勢位」，都能使「勢」發揮相加相乘（更好或更壞）的效果，所以他只好另闢蹊徑。一來將「賢」與「勢」對立起來，說它們之間相互矛盾不相容；二來說他現在要討論的「勢」不但不為「賢」或「不肖」考慮，並且還超越了慎到與反對者所說的「勢位」之論。

韓非將「賢者」與「勢位」設為「矛楯」的比喻是很牽強的。因為反對者所言，不論是「賢者乘勢」或「不肖者乘勢」，這「賢」與「不肖」都是「使用者」（主體），而「勢」則是被憑藉的「工具」（對象）。這裏的主體與工具，他們並非同類——其本質及主動機會都不同，所以彼此之間並不存在對不對立、矛不矛盾的關係，該被討論的應該只是使用的效果好不好而已。但由於慎到的結論，可以簡單化約為「勢優於賢」，而反對者的結論也可以簡單化約為「賢優於勢」，所以韓非得以順此將「賢」、「勢」對立起來，進而成立他的「矛楯」之喻。由於本身邏輯上的缺陷，所以韓非這一部分的說理及譬喻（「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無不禁」、「以不可禁之賢與無不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都十分勉強而糾纏不清，讀來費解，又不具說服力。我們試看古今眾家註釋、譯文，總是無法圓融解說，便可知其一二。

然而當韓非將「勢」的內涵轉向「制度」的設計與提倡時，卻展現了他對「政治」運作的深度理解與過人的前瞻眼光，超越了一般學者印象中的先秦法家之格局。

韓非所謂不必等待聖君賢相，只要有一個「常設」而能供人遵循的「勢」，由「中者」來駕馭使用，就能使社會上軌道；而不用的話也能使社會陷於混亂。此種陳述所指的「勢」可不就是「制度」嗎？[31]韓非所使用的譬喻：工匠之檃栝、度量之數，以及馭者之驛站、良馬固車，

31 金谷治認為此處之「勢」應與《韓非子》〈用人〉篇中之「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相對照聯想。見：氏著，〈慎到の思想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第7號（仙台：東北大學中國文史哲研究會，1962），頁8。金谷氏此說可謂先得我心。需要說明的是：〈用人〉篇這裏的「法術」，意義即為「法度」「制度」，而不是〈定法〉篇所云「術者，……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蔽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中之「法」「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些都與「位」、「權」、「威」無關，所以此處的「勢」不是「勢位」、「權勢」、「威勢」之義。觀乎現代「民主政治」的設計，也同樣是假設統治者並非聖君賢相（也不必是聖君賢相），他們在道德上不見得完美，而且是有缺點的人；但是這些道德上有缺陷、中等資質的人只要遵循一定的「制度」做事，那麼政治與社會基本上便都能健全運作而不至於敗亂。換句話說，只要能遵循完善的「制度」，則任何中等之資的人都能勝任統治工作；而且中等之資的人一個接一個遵循制度處理國事，便能使國家機器恆常而健全地運作。如此，何必一定要苦等零缺點的聖君賢相千百年才一現呢！我們若再檢視一次韓非的比喻，就會承認他的見解是相當鞭辟入裏的：「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

韓非這般見解，衡諸現實社會，證明了他對「制度」的效率及恆常性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就這點而言，他的政治主張不但為法家之冠，也超越了儒家。儒家過於倚賴「德治」，認為只要統治者道德高尚便可治理天下，因而疏忽了對「制度」的認識與建立，結果是令臣民經常陷於仰望聖人出世如同大旱之望雲霓般的苦境，而外王者的道德境界則亦未見提昇。現代的民主政治則證實了：在完善的制度設計及強制的制度遵循之下，即使中材也能治理天下，並且傳承久遠，而不必待諸聖君賢相。韓非這一部分的理論，誠如學者所言的「畫道德於政治領域之外，而建立含有近代意味純政治之政治哲學」，[32]確實應該給予他高度的學術評價。

然而《韓非子》書中絕大部分所言之「勢」，確實都是「權勢」、「勢位」、「威勢」之義，解為「制度」之義的「勢」也不過是〈難勢〉的後半篇裏空前絕後的「人設之勢」這一說法而已。此中真義本已十分不為人所知；再加上篇中前一個論點「賢」、「勢」矛盾譬喻的亂藤糾葛，更進一步湮沒了這個主張的真諦，讓世人以為此處的「人設之勢」並無特出之義，不外乎一般性的「權力」、「威勢」罷了。這是我們需要重新釐清之處。

32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頁2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從「相對關係」看戰國時代「勢」概念發展

筆者於別文曾對「勢」之本字「埶」與時間觀、空間觀的密切關係，以及「勢」概念所隱含的「相對關係」之義涵略作闡發。[33]在本節，將對此一議題作更深入的分析。因為在「勢」概念方萌芽還未普及運用的春秋時代，「勢」所隱含的時間觀及空間觀只略顯其端而已；到了戰國時代，「勢」的時間觀（「時勢」、「情勢發展」、「發展趨勢」）及空間觀（「地勢」、「勢不兩立」）之義涵則大有發展，頗值吾人探討。

從哲學的觀點來看，會構成「相對關係」，則相對的兩者之間必定存在著一定的構成條件，這是「相對關係」的「有條件性」；而這一定的構成條件，其中只要有絲毫改變，「相對關係」可能便不存在，所以「相對關係」是「暫時性的」、「有限性的」。因此，「相對關係」本身並不是那麼穩定，很容易隨種種內在或外在因素改變；而法家的「勢」論，卻是要鞏固君臣相對關係的永恆性。

「勢」的時間觀及空間觀，在本質上即帶有多層次的「相對關係」之義涵。第一個層次是「物質」佔有時間或佔有空間在兩定點之間的相對關係，即「此時與彼時」之「時間相對」，或「此地與彼地」之「空間相對」；第二個層次是指「人」與「時間」或「空間」的相對位置，以及「人」對「時間位移」或「空間位差」的反應；第三個層次是「人」與「人」之間的相對位置，以及其間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下文容再層層分梳。

「勢」的相對時間觀與相對空間觀——

第一個層次：「物質」佔有時間或佔有空間的相對觀

↓

第二個層次：「人」對「物」[34]的相對時間觀與相對空間觀—┬人對物勢的冷眼旁觀
　　　　　　　　　　　　　　　　　　　　　　　　　　　├人對物之時移的掌握
　　　　　　　　　　　　　　　　　　　　　　　　　　　└人對物之位差的掌握

↓

第三個層次：「人」與「人」的相對社會位差

33 同註1，前引拙文，第四節「『勢』概念所顯示的『相對關係』之思考」，頁1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一個層次，「物質」佔有時間或佔有空間的相對關係，這包括佔有「位置」的相對，如（時間上之）白天與黑夜、（空間上之）高山與深谷；也包括佔有「量」的相對，如（時間上的）萬年與分秒、（空間上的）大海與細流。這一個層次的相對關係，相對立的兩端都是「物」——同時是「時間」或同時是「空間」——因此這一個層次的思考，可說是與「人」的生活或生命無涉的純粹思辨。中國先哲在這方面的抽象思辨卻不發達，所以並無明顯的成績交出。唯有在進一步以「人」為主體，思考這（時間或空間）「位置」的相對及移動（如「四時遞嬗」「滄海桑田」）對自己的影響，或「量」的大小（如「夭與壽」）對自身的意義時，中國先哲的思考才活躍起來。這就必須進到第二個層次的探討了。

在第二個層次的相對關係中，相對關係的兩端有一端是「人」，另一端是「物」（時間或空間之「位差」或「位移」、時間或空間所佔有之「量」）。這一層次的思考，又可分為兩個子層次：一是「人」與所思辨的「物」保持距離，處於冷眼旁觀的立場；二是「人」與「物」之間有密切牽連，特別是「物變」會影響人的思考與行為。前者表現得最為出色的，當推莊子莫屬。《莊子》〈齊物論〉的「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秋水〉篇的「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相當程度地顯現了莊子「以道觀之」，將「物」的「量之相對關係」轉換到「相對主義」的範疇來思考，將事物的相對性絕對化，以解放一般人對「相對差異」之執泥。而在戰國時代甚至整個中國古代思想史上，《莊子》可能是曾經以「外在情勢」來思辨這層「相對關係」的唯一例子。〈秋水〉篇中，河伯與北海若有這樣的一場對話：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34 此處的「物」指「外物」（《莊子》〈外物〉篇：「外物不可必」），為廣義的「外在事物」之義，因此「事」含於「物」中。觀本文後面所舉之例，便可看出此中義涵。例如「滄海桑田」不僅是地球面貌的改變，亦指「人事」的變遷；而所謂的「勢不兩立」則常常來自於「事」，而不單是「物質之力」。但這些現象我們通常都可以廣泛視之為「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无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35]

河伯向北海若請教：世俗的議論都說「最精細的事物沒有形體，最廣大的事物沒有外圍」，這是真的嗎？北海若向他說明：如果我們從微觀的角度去看大事物的話，那是看不到全貌的；如果從鉅視的角度去看小事物的話，那是無法辨明細部的。所謂的「精」是微小中的最微小；所謂的「垺」，是廣大中的最廣大。可見小大雖不同，但各有其便，這是外在情勢使然。而人們經常提到的「精粗小大」，只能適用於有形之物；無形之物，卻是數量所無法析分的；至於沒有外圍之物，也是數量所無法窮盡的。也就是說，可以用言語議論的，屬於粗大之物；可以用心意傳達的，是精細之物。至於言語所無法議論、心意所無法傳達的，那就與精細粗大無關了。

北海若這一番話，是在教人解除外觀、形象上的相對概念之束縛，而進至於無言無意之妙理境界。這樣的主張，在〈秋水〉篇中，其實俯拾皆是；此處引起我們特別注意的，正是作者用「勢」這個概念來表達事物的相對性關係。

在第二個子層次中，「人」與「物」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而且「人」在這個層次的關係中，亟思居於主動操控的位置。此中，由於「物屬空間」較為穩定——例如物質上的「滄海桑田」對個人之生命而言是難得碰上的；而「物屬時間」則時刻在流轉，人事上的「滄海桑田」在個人生命中卻往往得面臨。因此對人而言，相對固定的「空間之勢」比不斷流變的「時間之勢」來得好掌控。「時間」既已流轉，外在情勢常隨之重新排列組織——亦即「相對關係」的「條件」已有所改變。「人」處於這「情勢重組」的改變中，固有其主動出擊之智慧與能力（如孟子引齊人之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但

35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秋水〉，頁5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亦常常為大環境（是空間、也是時間）所迫而無可如何，或者固執不肯改變自己，或者因缺乏足夠的智慧而不及或不知應變。因此前文在第二節中便已指出：「時勢」的意義，就個人而言，是「遇」、「不遇」的問題；就國家或領導者而言，是政策或措施「變」、「不變」的問題。在個人方面，除了大環境會左右一個人的「命」、「運」之外，導致其結果的最主要原因還是繫於個人的價值抉擇：選擇隨勢浮沉的，固然因「遇」而安；堅持自我、不願順時應變的，則即使「不遇」亦不應有怨言。而在國家或領導者方面，時勢既已改變，「逆勢操作」可能會危及整個群體的命脈，所以順應時勢改變政策者，才能在時局之流變中獲勝。這一點，戰國時代的君王、策士已都有所見。前文於第二節中曾引蘇秦對齊閔王、馬服對田單都有從用兵言識「時勢」之論；而趙武靈王之易胡服、學騎射克服了匈奴，應是最佳行動範例。因此，《商君書》有言：「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為之時勢。」[36]而變法者因時而化，不拘於今、不泥於古，更是《商君書》及《呂氏春秋》的共識：

> 聖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後於時，脩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為正。（《商君書》〈開塞〉）[37]

> 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天下有七十二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呂氏春秋》〈慎大覽。察今〉）[38]

在戰國時代，對大局「時勢」的思考，相較之下是比較少觸及的。最完整的論述也不過就是上述這兩則引文。但是親眼見到史上第一個統一大帝國興亡過程的漢初賈誼，則受到極大震撼，對於「時勢」的義涵有十分深刻的思考。

「空間」狀態既是相對的固定，則「人」可以以自己為定點或動點，對定點的「物」加以思考，所以易於掌控局面，使之成為有利於我方的態勢。這種空間觀最尋常的例子便是高山絕壁之「勢」對軍事作戰的意

36 《商君書》（據：四部備要本）卷四〈畫策〉，頁13下。如果這一篇成書於賈誼《新書》之前，則對於賈誼的「理」「勢」並列之論或有啟發之作用。

37 卷二，頁11下。

38 據：四部備要本。卷15，頁19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義。在《戰國策》中，蘇秦不但首揭「地勢」一詞，同時還指出了「地勢」對戰爭、對國防之重要性：

>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39]

日後賈誼在〈過秦論〉中也指出秦之能統一天下，並不由於秦王世世皆賢君，「地勢」之優異才是致勝主因：

> 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皆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40]

對「山川地理」的認識與掌控，是「勢」的空間思考中最普遍的一種。而《太平御覽》所收錄的魯仲連以「門關」為「勢數」之譬的說法，[41]則是人對「勢」的另一種空間思考。因為「門關」為房屋之一部分，是空間結構，因此「舉門關」的動作依靠的是「人」對「門關佔有空間的相對位差」之認識。「門關」儘管不同於「山川地理」，但其「勢」的空間思考模式卻是一樣的：扼住了關鍵點，即可輕易掌控局面。

除了上述「山川地理」與「門關」之外，在戰國時代還興起一種十分特別的「勢」的空間觀，那是「勢不兩立」。[42]質言之，人對「山川地理」或「門關」的掌控，這兩種思考都還是「人」在「物」外的空間觀，而「勢不兩立」卻是一種「人」在「物」內的空間觀——「人」之所以會在「物」內，是因「人」由於「力」的凝聚，而使自己成為一「物」；人力所凝聚成之「物A」，與另一股人力所凝聚成之「物B」，構成了

---

39 《戰國策》卷第三，「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頁1下~2上。

40 《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史公曰」引。據：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6，頁133上。

41 《太平御覽》（據：四部叢刊本）卷184〈居處部〉12，「關」，頁4。

42 這個觀念的來由可能與《孫子兵法》的「勢均」之說（〈地形篇〉：「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有某種程度的關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個互相不欲對方存在的抗衡形勢，此謂「勢不兩立」。在意義的陳述上，提倡「合縱」者也好、提倡「連橫」者也好，都可以從「勢不兩立」來立論：

> ……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43]

> ……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44]

此外，馮驩以「勢不兩立為雄」論齊、秦之雄霸東、西方，[45]而藺相如也以「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闡明不願與廉頗正面衝突。[46]戰國中後期這種「勢不兩立」概念的突出，在在顯示：此時期的「勢」之空間觀，已衍生出一種與「人」的「力」之間關係逐漸密切的思考潮流。

第三個層次的相對關係，便已脫離「物」，而完全以人類社會結構為思考之對象。亦即，這個層次的相對關係，其相對立的兩端都是「人」。因此其「時間相對位差」即指「年齡差距」，其「空間相對位差」即指「社會地位之差」。「年齡差距」會形成緊張關係，在中國是近現代受到西方思潮影響之後才產生的問題，而在「尊老敬賢」的中國古代社會裏是還不曾被思考的。所以在這一個層次中，「時間相對位差之勢」等於不存在；但「空間相對位差之勢」的問題卻十分嚴重。因為這種「社會位差」（「位勢」），高者對低者，如同高山之臨深谷，本身就已構成脅迫感（「威勢」）；而地位高者又握有較大「權力」（「權勢」），可以支配地位低者，所以又加重了彼此之間的緊張、對立局面。在此，我們進入了法家統治學上的「勢」論。這是第三個層次最特殊的地方：「時間位差」不在思考範圍之內，卻在「空間位差」的一端重重加上了「力」，而使得相對的兩端之間，不但無法取得平衡，甚至於還嚴重傾

43 《戰國策》卷第十四，「楚一」，〈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頁5下~6上。《史記》〈蘇秦列傳〉亦載。

44 《戰國策》卷第十四，「楚一」，〈張儀為秦破從連橫〉，頁7上。《史記》〈張儀列傳〉亦載。

45 《史記會注考證》卷75，〈孟嘗君列傳〉，頁953下。

46 《史記會注考證》卷81，〈廉頗藺相如列傳〉，頁992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斜。

這種嚴重傾斜，在古代中國社會中的父子關係、夫婦關係裏都已存在，而以君臣關係為最突出。蓋君王擁有最高的「勢位」、最大的「權勢」與「威勢」，這個狀態即使是靜止的也是一種類似「地勢險峻」的「勢」，對位居下方的臣子已構成嚴重的威脅；何況這個狀態並非靜止，君王又可隨時決定對臣子的生殺予奪，復令臣子在這已經失衡的天平中經常處於無法自主的被動浮沉裏。「勢」在中國政治社會生態中有著莫大的主導力量，廉頗的一段際遇，頗可道盡其中炎涼。《史記》載「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乃復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斥退這些賓客，卻反而有賓客勸導他識時勢：

> 吁！君何見之晚矣！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47]

臣有「有勢」「無勢」之變，不變的卻是臣無法自主的相對低下身份。這是法家「勢位」之論又使這失衡的相對關係更是雪上加霜的地方。[48]孟子主張與君王有血統之親的「貴戚之卿」應負監督君王、勸諫君王之責，如果再三勸諫而君王還是不聽，就應更換國君，另立族中賢人：「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至於沒有血緣的「異姓之卿」，則孟子更主張臣子有權主動解除君臣關係：「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49]法家則認為君上臣下的位置是不可互異的。關於這項主張一個最生動的比喻便是後來漢初黃生在景帝面前所說的「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之說，[50]因為「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

47 同上《史記會注考證》卷81，〈廉頗藺相如列傳〉，頁994下。

48 而孟子則主張君臣的相對關係是「對等」的，臣子能依君王的態度來決定如何對待君王：「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篇）。換句話說，臣子這一端的力道較強，且握有自主權。

49 《孟子》〈萬章〉下篇。

50 語出《史記》〈儒林列傳。轅固生傳〉。習儒術的轅固生與習黃老術的黃生在漢景帝面前論辯湯武革命合不合乎天命時，黃生的反對主張。《史記會注考證》卷121，頁1289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雖聖，臣下也」。因此以法家的觀點看來，湯武革命是不具政治正確性的。

前文提及「相對關係」的特點是「有條件性的」、「暫時性的」、「有限性的」。這在兵家，「勢」成為一種在戰略及戰術上「隨時隨地改變，以有利於我」的適應時空變化的思考模式；但在法家，「勢」的時空思考卻是僵固的。考其差異，應是來自於上面所提到的：法家不允許具相對關係的上下兩端有改變位置的可能。也就是說，法家努力使君上臣下的位置及其間的統治關係「絕對化」「永恆化」。如此，這層相對關係的「暫時性」、「有限性」卻被弔詭地固定下來，而使得上下關係僵化緊迫，無法適應時空之變化。這種僵固的「上下統治關係」的「勢」所能佔有及發揮的時空範圍頗小，僅限於它原有的時間空間，一旦離開了原有的時間空間，「勢」便馬上失去效用。以空間為例，秦國國君即使擁有再大的「權勢」、「威勢」，也只能施於秦國境內之臣民，出了秦國便毫無作用；以時間為例，秦朝帝王的「權勢」更無法加威於漢朝、唐朝、明朝、清朝的臣民。所以愈是僵固的上下統治關係，愈容易因時空之轉變而瓦解。尤其是韓非還認為「上下一日百戰」（《韓非子》〈揚權〉），在原本僵硬的「上下」關係上再添加了「隨時意圖置對方於死地」的不確定變數，將「勢」裏所富涵的「力」耗於「尖銳對立」及「爾虞我詐」上，非但沒有活化君臣關係的互動，反而使君臣之「勢」更為緊張，上下統治關係更加脆弱、更易解體。秦帝國為法家之治的典型實踐，而其國祚僅及十五年，正是最佳例證。

但是如果將此種富涵「力」的「勢」，從「君臣緊張、鬥爭」轉移到「制度之運作及傳承」上，使「上下」概念成為靈活的「時間連續」及「技術傳遞」，而非固定不變、尖銳對立的「人間位差」，則可以打破這種相對關係的僵固性、絕對性，解除原有的時空限制，為人間社會位差帶來彈性變化之可能，也為上軌道的政治傳承帶來維持永恆的可能。這正是〈難勢〉篇中「人設之勢」的價值所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六、結　論

以上探討了「勢」概念在戰國時代主要的發展方向。就形式而言，此時期開始出現「地勢」、「時勢」、「勢位」、「權勢」、「威勢」等複合名詞及「勢不兩立」之成語，使語詞意義更為明確，也使「勢」概念的流傳更為迅速、廣泛、持久。就義涵而言，舉凡吾人日常生活中各種與「外在狀態」、「外在發展」、「大自然或人為之力」、「時間位移」、「空間位差」……等概念有關的「勢」意義，在這個階段大抵都已確立，並沿用至今日；而春秋時代的「勢」概念所未觸及的「勢位」、「威勢」、「權勢」等鞏固君王地位、加強君王威權的主張，在戰國時代則大為興盛，並蔚為思潮主流。

因此不但兵書《孫臏兵法》受到影響而有「權者，所以聚眾也；埶者，所以令士鬥也」的法家式論調；[51]連大儒荀子也要在「尊君」的潮流下，對君王之「勢」一邊提倡一邊降低其重要性。荀子將戰國策士無明確對象、泛泛言之的「權勢」之說，明確歸屬於君王，並進一步提昇到理論層次；因此荀子這方面的「勢」論，在統治學上「勢」概念的發展過程中，實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而在集法家大成的韓非手中，這種統治學上的「權勢」、「威勢」、「勢位」意義，固然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但在〈難勢〉篇中，韓非卻創出「制度」意義的「勢」，使「勢」概念的發展在此別開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從本文的考察及分析，可以看到「時間發展」及「空間位差」所形成的兩種不同的「勢」觀，到了戰國中後期已是知識階層很普遍的概念及言論。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中，儘管這方面的概念缺乏純粹理論性的思辨推演，但是一旦落實到「勢」與「人」之間的關係思考時，則奔走於

51 語出《孫臏兵法》〈威王問〉（據：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臺北：明文書局，1985〕，頁27~28）。這已經脫離了兵家的「勢」論。因為做為兵家核心概念的「勢」一直是「對外」的水平思考；而「權者，所以聚眾也；埶者，所以令士鬥也」卻是「對下」的垂直思考，是法家之「勢」。我們都知道「水平思考」比「垂直思考」來得靈活，這也是法家「勢」論所以僵固的基本原因之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七國間的策士及著書立說的諸子，對於「人」之於「空間之勢」的深刻認識以及人之於「時間之勢」的無奈或企圖掌握，卻都有很動人的闡述；而屬於空間概念的「人間之勢」，則在法家手中完成最充分的發展——法家「勢」論明確主張居上位者應擁有位差優勢（「勢位」），及由此而來的對下壓迫感（「威勢」）與馭下權力（「權勢」）。此外，法家並主張這種空間架構應永遠維持，不允許其間有易位轉換之可能，目標是要永久維持這種相對關係之存在；然事實卻因上下之間的尖銳對立及僵固不變，而反諷地造成了這種相對關係的時空限制及脆弱易碎。而《韓非子》〈難勢〉篇中「制度」義涵的「勢」，則帶來彈性及持久性，有助於化解這種相對關係的緊張及脆弱。

若再配合「勢不兩立」的言論觀之，可以發現：在戰國時代，知識階層空間觀的「勢」概念強過時間觀的「勢」概念。至於這較弱一環的時間觀之「勢」，則有待賈誼來進一步開拓與補強；這也是筆者下一份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

（責任編輯：張藝曦　　校對：唐立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tion of *Shi* in Ancient China, 403-222 B. C.

Lu, Ruei-ro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tion of *shi* 勢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its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in terms of relativity. I argue that *shi* as a notion of governance became well developed between the 5th and 3rd centuries B.C. However, the Confucian philosopher Mencius and the Taoist philosopher Zhuangzi both refused to concur with the dominant current of thought, which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shi*.

Xunzi, who theorized about *shi* on various levels, held some contradictory opinions toward the *shi* of a king . Hanfeizi developed a new notion of "man-made *shi*" (人設之勢) that denote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esigned by man.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notion of *shi*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mprises views of both "time" and "space."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thinkers in this period devoted much more attention to the aspect of "space" than to "time."

Keywords: *Shi* 勢, Confucianism, Taoism, Legalism, Relativity, Notion of time, Notion of spac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